

中国教育史研究丛书

中国教会学校史

高时良主编



G529.6/15*

中国教育史研究丛书

中国教会学校史

高时良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会学校史

高时良 主编

责任编辑：葛开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东风路附1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6毫米 32开 印张：11.5 字数：290,000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355—1980—6/G·1975

定价：12.8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中国教会学校史》经过编写同人的辛勤劳动，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教会学校在旧中国，从幼稚园、小学、大学到研究院；从普通教育到师范、职业教育，既自成为完整的教会教育体制，又构成旧中国学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它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一百多年岁月，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所引起的效应，至深且巨，使得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科学史等都得在不同角度上从中去探索来龙去脉及所起的作用。教会学校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的主要手段，这一本质规定实际上不是中国人民强加于当年英、美、法各国头上，恰恰是它们在华的政治行为给自己写下了这段历史。上个世纪，曾在山东传教，并以创办登州文会馆闻名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说过：“教会学校建立的真正目的，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教师和其他领袖人物。”可见，教会学校的教育实质，与其说是宗教的，毋宁说是政治的，要“中国基督化”者，乃要使中国殖民化也。本世纪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总统罗斯福的函件说，哪个国家“能在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的事业上成功”，哪个国家就会“在道德、知识和商业的影响收回最大可能之收获”，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历史进程是错综复杂的。教会学校在近代中国，可以说它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产物，又是按照国际社会生活节奏，中西文化进一步交流的产物。这就构成了“教会学校性质的二重性：一方面既力图利用宗教影响中国人民；另一方面又在输送近代科学和先进的教育模式。它们主观上力图保存中国的生产关系，而客观上又在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教会学校向何处去，便始终成为上个世纪以来在华传教士们争论的焦点。

教会学校教育的矛盾性既然成了历史现实，那么首先，对教会学校的“设立人”即西方教会来说，想仅仅保留宗教而摒弃科学是不可能的，正如当年狄考文所承认的，“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索、渴望学习西方的科学，科学的名声已传遍中国的每一角落”。在这种客观形势下，传教士们既意识到“科学不成为宗教的盟友，就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才提出“科学与宗教联盟”来自圆其说。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移，不应用近代科学来武装教会学校学生，提高学生素质，以便就地取材，也必不会给外国在华各种既得权益带来好处。西方有些人士津津乐道中国之有近代科学和新型人才，是全受教会学校之赐。对这个论点要作全面分析。必须看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革命，即使没有国外引进近代科学，它也会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会有新型学校及所培养的合乎时代要求的人才出现。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不是已有有志之士如王大海、李兆洛等人四出海外寻求科学奥秘吗？在华南和协和大学设立之前，在福州不是有了传授崭新的科学技术的船政学堂吗？

那么回过来，对咱们中国人如何对待教会学校来说，我们是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反对把《圣经》搬上讲台和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的。但这也不能把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完全归咎于教会学校教育。宗教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扩散开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人们的精神境界还受着自然和

社会某种力量的支配，而不能或不知道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和
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时，就会伸手向上帝寻求保佑，这就是没有教会
学校存在，而中国仍然存在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的根源所在。历史
上的民间反教，不能单纯看成反对外来宗教，主要是由于当年在
华传教士为非作歹，包庇莠民，武断乡曲。教会学校的教育特性，
不仅为传布福音，还有各种教育、教学的内容和方法配套。一百
多年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抵制教会学校不正常的教育设施，抗
拒有些学校当局虐待学生，到反对外国侵犯中国教育主权，实质
上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应当说他们大方向是对的，在运
动过程中出现某些矫往过正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方
面。另一方面是，西方教会为了忠实执行其所在国在华的殖民主
义统治，便抓住教育这条重要渠道，而为了同中国的公立学校
竞争，教会必然要在财力、物力、人力诸方面付出重大代价，把
学校办好，以达到其预期的政治目的。旧中国文化教育、科学技
术原不发达，而教会学校又不能一时信手挥之便去，则革船借箭，
利用其健全的师资队伍，充裕的教育资源，在接受我们政府管理
的前提下，来为我们服务，并为公立学校树立竞争对手。五卅运
动时期，反对教会教育达到高峰时，教育家朱经农曾提出对教会
学校作有条件的改良，他的意见是：小学校当我国义务教育未普
及时以前，可以暂时容许教会办小学，但要遵照我国新学制课程
的规定，也不许违背我国的国情和需要。中学可以让他们聚精会
神，办几所好的试验学校，间接可促进我国中学的努力，直接可
得点取得参考的机会。大学是无所不包的学府，只要他们不违背
我国的国情，也尽可任他们办去。总的是要教会学校接受中国
政府的监督考查，注重中国文化传统，不可入主出奴。这些意见
倒是从实际出发，采取因势利导的好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收回教育主权，对教会学校进行一番改造，转化为公立学校，这
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教会学校在办学模式、教学体制等
方面保存的优良传统，所积累的合乎教育客观规律的经验，仍值得

我们借鉴与继承。

这说明，对待教会学校，既要将它本身的运行过程同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行径联系起来考察，又要从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教育自身的客观规律来考察。从右的方面全面肯定它是错误的，从左的方面全面否定它也是错误的。应当全面地看问题，对它进行科学分析与总结。我们即遵循这一初步看法，作编写《中国教会学校史》的尝试。

本书上从景教进入中国及其所进行的文化教育活动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彻底收回教育主权为止，内容既表述教会学校发展的全过程，也表述中国人民反对教会教育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全过程；既坚持教育与宗教分离，又把强迫实施宗教教育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区别开来；既否定教会教育中的消极因素，又肯定其值得参考的经验，做到实事求是，对其办学成绩和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参加本书撰写的有福建师范大学高时良、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黄新宪、北京师范大学史静寰、香港中文大学吴梓明、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南京大学任利剑、中国社会科学院姬虹、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郭少榕。章节的分工是：

第一章：高时良

第二章：第一节吴梓明，第二节高时良

第三章：第一节郭少榕，第二、三节姬虹；第四节姬虹、高时良

第四章：第一节高时良，第二节史静寰，第三、四节黄新宪，第五节任利剑（金陵大学）、黄新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第五章：第一节高时良（福建协和大学）、黄新宪（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第二节周洪宇（华中大学）、黄新宪（华西协合大学），第三节吴梓明（岭南大学）、周洪宇（北京协和医学院），第四节高时良（震旦大学、天津

工商大学)、史静寰(辅仁大学)

第六章:史静寰

第七章:黄新宪

第八章:高时良

结 语:高时良

本书由高时良主编。

本书以教会高等学校教育为主线,除表述各校的历史轨迹,揭示其客观发展规律外,着重介绍、总结其学校行政管理和教育、教学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以为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教育改革的参考。

中国教会学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有关文献资料诸多散佚,有的还保藏在海外,难以检阅参考应用。有些史实,包括有关统计数字,各书刊记载亦不一致,一时难以核对考证。由于教会学校在中国大陆消失已将近半个世纪,原有师生或在海外,或已辞世,或因事隔多年已印象模糊。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作比较广泛的调查访问和查阅现存档案材料,仍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之处,尚希大家不吝指正。

编 者

1993. 5.

目 录

第一章 外国教会在华传教办学的历史考查	(1)
第一节 西教士东来及其早期文化教育活动.....	(1)
第二节 不平等条约付出的沉重代价	(14)
第三节 各国教会在华办学的势力竞争	(27)
第二章 近代中国最早设立的教会学校	(42)
第一节 最早设立的基督教(新教)学校	(42)
第二节 最早设立的天主教学校	(51)
第三章 教会初、中等学校	(57)
第一节 教会初等学校(附幼稚园)	(57)
第二节 教会中学(一)	(66)
第三节 教会中学(二)	(73)
第四节 教会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	(101)
第四章 教会高等学校(一)	(107)
第一节 教会高等学校综述.....	(107)
第二节 燕京大学与齐鲁大学.....	(117)
第三节 圣约翰大学与沪江大学.....	(133)
第四节 东吴大学与之江大学.....	(142)
第五节 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53)
第五章 教会高等学校(二)	(166)
第一节 福建协和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166)
第二节 华中大学与华西协合大学.....	(177)
第三节 岭南大学与北京协和医学院.....	(187)

第四节	震旦大学、辅仁大学与天津工商大学·····	(200)
第六章	教会学校宗教教育及其方针演变·····	(216)
第一节	19世纪末以前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	(216)
第二节	20世纪以后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	(224)
第七章	教会学校的学生爱国运动·····	(235)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的学生爱国运动·····	(235)
第二节	“五四”和“五卅”时期 的学生爱国运动·····	(238)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到解放战争时期 的学生爱国运动·····	(243)
第八章	从反对教会学校教育到收回教育主权·····	(249)
第一节	早期反教运动与教会学校·····	(249)
第二节	反宗教教育思想理论的建立·····	(255)
第三节	20年代的“反基”、反教会教育·····	(261)
第四节	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	(267)
第五节	教会学校的注册立案过程·····	(275)
第六节	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对华的文化侵略势力·····	(285)
结语：	中国教会学校的历史评估·····	(292)
【附录】		
一、	台湾几所教会大学简介和教会中学名录·····	(302)
二、	吴梓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简介·····	(312)
	附香港基督教各宗派办学简表·····	(317)
三、	吴梓明、马敏：美国收藏之中国教会大学 历史文献简介·····	(318)
四、	UBCSEA 档案中所藏中国基督教 教会大学出版期刊一览（吴梓明提供）·····	(342)
五、	吴小新：有关北京辅仁大学前期历史 （1927—1933年）在美国所藏档案简介·····	(348)
本书参考书刊简目 ·····		(352)

第一章 外国教会在华传 教办学的历史考索

第一节 西教士东来及其早期文化教育活动

中国教会学校是伴随着基督教的传入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在叙述教会学校的成长之前，得追溯西教士东来的历史。他们的一系列行动，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又是殖民主义者对华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产物。

作为中世纪欧洲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基督教从16世纪掀起宗教改革运动以后，一个代表着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教派崛起，脱离罗马公教^①，成为今天的基督教，在我国亦称为新教；而罗马公教即天主教，在我国亦称为旧教。它们都通过各自的传教士在我国传教办学。

一、天主教（旧教）传入及其文化教育活动

早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前，那些广义的基督教即开始传入中国。但其具体时间，众说纷纭。其于史有征的则为公元635年，即唐

① 随着罗马帝国东西两部的分裂，基督教也于1054年分裂为罗马公教（即天主教）和正教（亦称东正教）。在中国，天主教会办的学校亦称为公教学校。

贞观九年，波斯僧阿罗本（Alopen，或作 Alopun、Olopan，有说他的原名为亚伯拉罕〔Abraham〕，属以色列族系）到达唐国都长安，唐太宗曾派遣宰臣房玄龄“总使西郊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①。那时不叫基督教，而称之为景教，属于基督教的别支聂斯脱利派^②。明天启五年（1625年）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

贞观十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象，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

穆启蒙（Rev. S. J. Joseph Motte）于其所著《中国天主教史》（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一书中，还报导聂斯脱利派传教士已于此时或后些时间在华创办学校：

聂斯多略的传教士便追随着商队，或自行扮作商人，或乘坐商人的船只潜入中国传教。他们当时的一位宗主教曾有这样的记载：‘许多人只带着一根手杖和一只行乞的布袋，梯山航海到印度和中国去传教。’他们能讲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的语言，甚至在每一站，能杂在民众中，召集听众，宣讲他们的教义。如果首次接触胜利，便在那里安排下传教站，附设旅店和学校^③

依历史记载，景教教义首先是在唐代上层社会中传播，特别是在王宫，成为宫廷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后则在唐统治者容

① 见大秦寺僧景净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② 以建教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多利（Nestorius）得名，曾被目为天主教的异端，但在波斯曾称盛一时，唐时曾开放了通往波斯的大道，则阿罗本来华这事当是可信的。

③ 见该书侯景文译本，台湾光启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许下，逐渐向民间推移，成为当代社会宗教教育的一支方面军，如《景教碑》所说“法流十道”^①，“寺满百城”。下效基于上行。太宗不仅召阿罗本入宫讲道译经，还“命有司将帝写真（为皇帝画像），转模寺壁”；高宗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肃宗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饌以光景众”，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且为竖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扬“真主无元”，“起地立天”。^② 总计景教在唐代经历六代皇帝，凡二百年而未尝衰替。

但是，作为外来又是晚传的宗教，景教同土生土长的道教和先入为主的佛教比，特别是面对儒学的强大凝聚力，毕竟难以抗衡。到文、武宗时，由于寺院势力侵犯了世俗地主的利益，政治和经济上矛盾加剧，首先是佛教，如佛寺“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僧尼不事劳动，“待农而食，待蚕而衣”^③ 乃有公元845年的会昌禁教，对包括景教在内的各外来宗教施加了压力，抑制其扩张。晚唐迄宋，景教传教士和教徒们只能在蒙、疆边界悄悄地活动^④，已无复当年显赫，所谓“教化大行”之势了。

裴化行（H. Bernard）于其所著《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一书中，说到“天主教所以能不受限制地扩充她的领域，可以说是凭藉成吉思汗的远征”；又说“元朝得到天下以后，倒很能一视同仁。……在宗教方面，允许人民有信仰的自由。按说蒙古人所崇奉的宗教本是多神的。所以朝廷在那时候，对于各种宗教是兼蓄并收，来者不拒，天主教他们附和，景教他们也附和；佛教他们附和，回教他们也附和”^⑤。穆启蒙的《中国天主教史》也

① 唐代分天下为十道。

② 以上均载《大秦景教流行碑》。

③ 见《旧唐书》卷十八。

④ 据穆启蒙《中国天主教史》记载，公元950年聂斯脱利派的一个宗主教，从波斯派遣六个修士前来中国视察，竟连踪迹也没寻到。见侯译本第11页。

⑤ 见肖浚华译本，商务民国25年版，第29—30页。

有一段记载：“一日，世祖向马可波罗声明说：“有人敬耶稣，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那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佑我。”^① 这说明了基于政治上需要，基督教到元朝乃得到复苏。可那时候，在中国既不叫基督教，也不叫天主教和景教，而是叫也里可温教 (Arkaun)^②。

成吉思汗仅仅为中西文化交流创造政治条件，也里可温教之得在中土立足并得到发展，实出于元世祖忽必烈之赐。相传公元1269年，有两名威尼斯商人从中国北京回去，“他们带来大汗致教宗的信，请求派遣‘百名精于教义且娴习七艺者前来’。”^③ 这里所谓“七艺”，当指欧洲中世纪教会学校所传授的“七种自由艺术”，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哲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理论等七门高级课程，这说明了忽必烈在其建立元政权的前夕，就注意引进西方教会学校的教学经验。

受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 (Nicolas IV) 派遣，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由方济各会教士若望·孟高维诺 (John of Montecorvine) 率领一个使团携带教皇给元朝皇帝的信，由波斯、印度辗转来到中国，他抵达北京时，元世祖刚刚去世，继位的成宗也以礼相待。相传自印度陪伴孟高维诺来华的一个意大利富商，在皇宫附近为其购买一块地皮，孟高维诺即在那里建造圣堂，“他召集了许多儿童，教给他们咏唱日课，有时在御前咏唱，皇帝很为欣赏。”^④ 有的文献也记载孟高维诺“曾收养幼童150人，加以教育，授以希腊及拉丁文，并圣歌、《圣经》等，后来又为施洗礼，收为信徒^⑤。此后传教士陆续东来，吸引不少中国人受洗礼。到元

① 见侯译本第23页。

② 或作 Arcoun, Arkaium, Erkeun, 意为信奉福音的人。

③ 《中国天主教史》，侯译本第20页。

④ 同上，第25页。

⑤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4页。

末，虽然最后一个皇帝顺帝曾与教皇互组使团应聘，并赠礼物，但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传教士承继乏人，也里可温教也随着元亡而几濒于绝迹。

明初朝廷禁止外人进入内地，尤严教禁，传教士象方济各·沙勿略 (Francisco Xavier) 等都曾企图以日本、印度和澳门为跳板，进入中国大陆。沙勿略意识到中国是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乃企图利用学术和教育来打开传教的局面，裴化行曾说沙勿略计划到日本后，“要先到大学里，去同一些有高深知识的学者联络，用自己的学识教导他们”，使其认识造物的主， “以后到中国及印度等处，也要按照这种方针做去”，沙勿略“又请求许多别的修士们上中国去传教及教授这里的大学”^①。只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1552年竟以饥寒交迫，死于广东附近的上川岛上，那唯一给守灵的是中国人安多尼，一个印度卧亚 (Goa) 城公学“最有德行的学生”^②。从这段历史记载，表明了十六世纪就有中国青年在天主教公学里就学。

1555年，一个葡籍耶稣会士巴莱多 (Melchior Nunez Barreto) 终于沾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光，留居广州，但时间不长。七年 (1562) 后，又有一个耶稣会士方济各·培莱思 (Francisco P'erez)，他乘葡萄牙政府派遣代表团到广州，要求粤督准许葡商在澳门进行经济和外交活动之机，以代表团成员，亲自要求留在广州，“专门从事讲授学识”，没有获准而遣返澳门。在那里，他创办了一所圣保禄书院^③，收徒讲学。

1578年，被认为“沙勿略的适当继承人”范礼安 (Alessandro Valignano)，以视察耶稣会东方传教区的名义来到澳门。他在这里逗留仅八个月，没有象在印度、日本那样“扎营结寨”，成立教区，

①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肖译本第64—65页。

② 同上，第77页。

③ 见赖怡恩 (Thomas F. Ryan, S. J.)《耶稣会士在中国》序言，陶为翼译本，台湾光启出版社1965年版。

建造教堂，开办学校。他摸清那具有传统文化意识的中国人，不会那么容易皈依“真主”，他的哲学是：要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首先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其使中国人西国化，不如先使传教士中国化。为此，他认真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风俗习惯。继他而来的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即按他的意旨行事。那被认为第一个主张用中国语言文字传布基督教义、伴随罗明坚东来的费司铎(Ferrante Capace)，他已能用中文编写天主教义，同时给华人传授西方算术。但系统地应用西方的学术文化，以为在华传教的辅助手段的，‘却是1582年来华担任罗明坚助手的利玛窦(Matteo Ricci)。这个实践“传教士中国化”的耶稣教传教士，他穿著中国服装，操中国语言，读中国经书，在广州和北京除了布道，其主要时间几乎用于向士大夫阶层讲授天文、地理、历算。一时从其学者甚众，有些人还受洗为虔诚教徒，如徐光启、李之藻。那作为罗马大学讲义以及欧洲各大学普遍读物的《几何原本》，即由利玛窦、李之藻两人合译，收入《天学初函》中。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由南京礼部侍郎发动的反教运动，传教士有被捕和发配的。但是天主教传入中国作为历史的产物，要把它赶出国门是不可能的，何况从明代起，外人在华传教已伴以传播西方文明，如输入西洋历法、测天仪器、欧式大炮、泰西水利建设工程、西画与西乐，以及几何、三角等知识。后来汤若望(Jo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萧规曹随：汤若望于明末为朝廷修订历法，监铸大炮，南怀仁于康熙年间任钦天监副(钦天监有时宪、天文、漏刻诸科博士，也有天文生和阴阳生，所以它既是天文馆，又是一所中央天文学校)，曾指导康熙帝学习算术、天文学和哲学。穆启蒙的《中国天主教史》记载南怀仁为了使中国归化，曾有个远大计划，即如同利玛窦一样，先争取知识界的同情与支持，然后逐渐开办学校，吸取耶稣会士在欧洲的教育经验，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培育公教青年，同时也讲授儒学，如此“薰陶渐染，使天主教的酵母

渗入而发展”。^① 康熙年间还有两名耶稣会士，一为张诚 (Gerbillon)，另一为白晋 (Bouvet)，曾为御前侍讲，在宫中讲授测量学、几何学、解剖学、医学和化学等新型学科。乾隆年间的郎世宁 (Giuseppe Castiglions)、戴世贤 (Ignaz Kogler)、蒋友仁 (Michel Benoist) 也以传教士兼教师的身份，为宫廷权贵们讲授绘画及天文、地理；蒋友仁还给乾隆帝做空气的压缩、膨胀原理实验。

嘉庆、道光年间，教案迭起，传教士在中国中下层社会中印象都不佳。他们没有象汤若望、南怀仁、蒋友仁那样，在宫廷中任要职，有皇帝或权贵们撑腰；再则这些传教士多半来自法国，而自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新政府阻止传教士东来，原住在中国的也由于法国官方未予支持，经济来源断绝。十九世纪初，设在北京的南、北堂—原来的传教和教育两条支柱，至此也摇摇欲坠。北京如此，其他地方亦无善状可陈。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在华天主教会的衰微时期。

光绪年间，一些传教士们也想以科学文化为传教为响导。如遣使会的谭道微 (Armand David) 搜集各种植物品种移植中国，耶稣会于 1872 年在上海徐家汇建天文台，设立印书馆；北京北堂设立的印书馆，编印辞典，翻译或重印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名著。90 年代来华的雷鸣远 (Vincent Lebbe) 在北堂一面教书，一面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说“圣保禄假若当时墨守他的犹太人生活成规，便不可能使教外人归化”。他在天津还办了出了名的《益世报》。但尽管那时传教获得清政府的宽容，而民间对教会并不怀好感，教案亦此起彼落。

二、基督教（新教）传入及其文化教育活动

作为新教的基督教传入中国，比天主教要晚一千一百多年。

^① 见侯译本第 78—79 页。